

王开林

从丁酉年(1897)冬至戊戌年(1898)春,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,共讲学三个月。现在看来,他在长沙的这段经历是非常特殊的,借此机会,他与诸多湘贤结缘结交,或加深加固了旧谊。蔡锷成为了他最得意的弟子,谭嗣同成为了他最敬佩的友人。与杨度、皮锡瑞、唐才常相识,也都是在这个时期。

梁启超与湘贤王闿运、熊希龄也多有交集。当年,湖南巡抚陈宝箴委任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总提调。为梁启超安排讲学活动,照顾其日常生活,便是熊希龄的分内事。1905年,清朝五大臣(戴鸿慈、端方、载泽、尚其亨、李盛铎)出洋考察宪政,熊希龄受命去日本请动梁启超当枪手,撰写了五篇考察报告(民国著名报人陶菊隐著《六君子传》,言之凿凿地说,出洋五大臣的考察报告是熊希龄请杨度撰写的,此说实为讹传。夏晓虹教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梁启超的原始稿本,真相浮出水面)。1914年,熊希龄聘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,组织名流内阁,邀请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,梁启超欣然应命。这些事实充分说明,梁启超与熊希龄是彼此认可的。

梁启超对湘人一直友好相待,即使顽固的保守派分子叶德辉疯狂且恶毒地攻击过他,他也认为“叶平时为人本不自爱(学问却甚好)……”。

本文各有侧重地介绍他与六位湘贤(谭嗣同、唐才常、王闿运、杨度、皮锡瑞、蔡锷)的交谊。

1. 梁启超与谭嗣同、唐才常

梁启超与谭嗣同从相识到深交仅有三年时间。乙未年(1895),梁启超与谭嗣同相识于北京,他致书康有为,称道谭嗣同“才识明达,魄力绝伦,所见未有其比”,但又惋惜谭嗣同“佞西学太深”。丁酉年(1897)冬,梁启超来到长沙,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,用《孟子》和《公羊春秋》为教本,主张民权之说,撒下了变革的种子。迨至戊戌年(1898)春,三个月时间,梁启超与谭嗣同朝夕相处,称之为“讲学最契之友”。两人投徒之余,还一起为解除妇女同胞的缠足之苦奔走呼吁,倡议各项新政,同为《湘报》撰文。此外,他们还要应对顽固守旧派分子叶德辉、苏舆等人隔三差五的谩骂。当时,湖南是全国维新变法的重镇,他们同为“箭垛式的人物”,是褒贬臧否所集矢的目标。

梁启超与谭嗣同志同道合,确有知己之感。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时,谭嗣同将自己全部的诗文稿件托付给好友,此举不似托孤,却胜似托孤。梁启超劝谭嗣同留在日本领事馆,一起逃亡海外,谭嗣同以壮语自明心迹:“不有行者,无以图将来;不有死者,无以召后起!”至此二人肃然立约“程婴杵臼、月照西乡”,遂“一抱而别”。

谭嗣同义薄云天,把“行”而“图将来”的机会留给梁启超,把“死”而“召后起”的任务留给自己。行者与死者各司其责,原本不存在孰勇孰怯、谁高谁低的比较和区分,但他主动选择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,这种英风侠气不禁使人油然而生敬佩之情。谭嗣同被捕前一天,仍有数位日本志士来苦劝他东游避祸。谭嗣同的一席话掷地有声:“各国变法,无不从流血而成,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,请自嗣同始!”自此参与变法,他就选择了责任和担当。

梁启超在海外刊发亡友遗稿,撰序称赞《仁学》“为法之灯,为众生之眼”。他还撰写了《谭嗣同传》,卒章言其志:“……通乎此(即仁学)者,则游行自在,可以出生,可以入死;可以仁,可以救众生。”梁启超称赞谭嗣同为“国民先觉”,还下一个重要的结论:“谭浏阳志节、学行、思想,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,不待言矣。”这句话的分量沉甸甸的。

谭嗣同与唐才常“少同乡,长同学,生同志,死同烈”,梁启超与唐才常相识则较晚。乙未年(1895),梁启超询问谭嗣同的至交好友是谁,后者的答复是“二十年刎颈交,绂丞一人而已”,唐才常号绂丞,又号佛尘。丁酉年(1897)冬,梁启超应约来到长沙,谭嗣同介绍他与唐才常订交,唐才常赠送一方产自浏阳的菊花砚给梁启超,此砚遭际不凡,由谭嗣同作铭,由江标刻字。铭文为:“空华了无真实相,用造翦鬻起众僧。任公之砚佛尘赠,两君石交我作证。”戊戌年秋,梁启超匆匆离京,这方未及带走的菊花砚从此杳如黄鹤,多年后,他撰诗话缅怀故人,仍“念之凄然”。

当年,梁启超告别时务学堂,曾恳请唐才常接任其职。唐才常对梁启超评价很高:“卓如汪洋千顷,今之叔度,外似温柔,内实刚劲,尤非人所易知。夫子曾与绍航言云:‘天挺异材,五洲仅见。’受业等极叹为知人。”

己亥年(1899)八月,唐才常离开上海,先到香港、南洋,后至日本,先后与康有为、孙中山会晤。当时,康有为、梁启超奔走于海外,倡议保皇,向华侨募捐,以图起兵勤王,他们眼中的那位徐敬业,非唐才常莫属。然而令人痛惜的是,由于经费不足,事机不密、行动不齐,自立军起义失败。庚子年(1900)秋天,唐才常在汉口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杀害。事后,梁启超唁慰唐家,一度筹款周济唐才常的亲人。



1899年的梁启超。

梁启超与多位湘贤的交谊

编者按

19世纪末的中国,新世界大潮浩浩荡荡,政坛瞬息万变。作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文化精英,梁启超参与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诸多重要事件。在湖南维新运动中,他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,促进了湖南新学传播,也与湘湖志士结下了情谊。2023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年,《湘江周刊》特别约稿,以志纪念。

2. 梁启超与王闿运、杨度

1914年,王闿运致书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梁启超,起首之语是“一别廿年,风云万变”,若廿年非约数,梁启超与王闿运的交往就应早于丁酉年(1897)。王闿运是旧派人物,经学家,诗文为豪,对于维新变法素持异议,有“新学无神,人心益陷”的论调。王闿运治群经,首重《礼经》,尤严夷夏之防,认为学习洋人政教无异于“以夷变夏”。清末时,他阻止过儿子王代功、王代懿、弟子杨度留学日本。

进入民国后,他仍然认为杨度深中洋毒,必须用老庄之学透析才行。王闿运抗拒新潮流,憎恶革命派,视之为目无君父的乱臣贼子。他对维新派同样缺乏好感,如何看待梁启超,就可想而知了。一个诗文俱佳、颇具幽默感的聪明老头,偏偏对于激变的时代潮流缺乏理解和共情。

梁启超并不佩服王闿运的经学研究,批评他“经学所造甚浅”“拘拘于例,无甚发明”“徒自增其妄而已”“颇有小慧而学无本原”。梁启超评论王闿运的史学著作《湘军志》,也颇有微词:“壬秋文人,缺乏史德,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。”表扬的话只有一条“文采可观”。两位大“傲哥”,注定做不到“相看两不厌”。

庚子年(1900)正月十二日,梁启超拜访旅居杭州的王闿运。王闿运倚老卖老,姿态极高,暗讽康有为、梁启超一派人物实为名利之徒,并非真豪杰,距离孟子所称道的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的大丈夫标准都差得远。

1914年,王闿运致书时任司法总长的梁启超,事由是湘乡有位寡妇要到京城诉冤,王闿运同情她,请梁启超受理此案。他先是为梁启超着想,说司法系统是个烂摊子,不好收拾,司法人员素质低,弄不好就会招致怨恨。我没打过官司,但听说过不少颠倒是非的案件。狱狱关乎人命,不知你有什么挽救的良法。信末,王闿运不失诙谐地调侃道:“闲人干涉法官,例有应得之咎,想非言论自由可以解免。惟多年睽隔,聊志勿谏,以示洞阿尚念念尔。”他拈出《诗经》篇目,轻松自如地抽掉了掉书袋,学问家的高级感就有了鲜明的底色。

梁启超与杨度的交往始于戊戌年(1898)正月二十三日。这天,杨度从湘潭乘船到长沙,他先往湘绮楼拜见业师王闿运,恰巧王闿运去了衡阳。他听说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在省城讲学,新近名头响亮,就决定去时务学堂会会他。杨度是王闿运的得意门生,梁启超自然不敢怠慢。两人讨论《春秋》《孟子》,杨度雄辩滔滔,对康门学说多有批驳。在当天的日记中,杨度写道:“论辩甚多,词气壮厉,卓如初犹肆肆,后乃遁词。然而其人年少才美,乃以《春秋》骗钱,可惜!可惜!昏

暮乃去。”两人均年轻,杨度二十三岁,梁启超二十五岁。杨度以气势取胜,竟称梁启超靠《春秋》骗钱,初识的印象显然不佳。

1902年,杨度留学日本,任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会长,梁启超是《新民丛报》主笔,两人的交往日益频繁。那段时间,梁启超推重杨度,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,视杨度为“谭复生复生”(谭嗣同再世),他为杨度的长诗《湖南少年歌》作引言:“湘潭杨哲子度,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。昔卢斯福演说,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,请视杨格兰德;吾谓欲见纯粹之湖南人,请视杨哲子。项哲子以新作《湖南少年歌》见示,亟录之,以证予言之当否也。”

这个评价有无水分?现在的答案肯定对杨度不利,然而在上个世纪初,同盟会尚未成立前,中国留日学生几乎不会对此抱持任何异议。当年,梁启超作《少年中国说》,举世一读而心雄;杨度作《湖南少年歌》,众人一唱而血沸。“我本湖南人,唱作湖南歌。湖南少年好身手,时危却奈湖南何……中国如今是希腊,湖南当作斯巴达。中国将为德意志,湖南当作普鲁士。”杨度与梁启超,一个是英锐的“湖南少年”,一个是激进的“少年中国之少年”,这种猛志固常在的狂飙精神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。

民国初期,杨度主张君主立宪制,梁启超主张民主共和制,两人的政见分歧日益明显。1915年,杨度撰《袁世凯国论》,认定惟有君主立宪可使国家培元固本,避免流血革命。梁启超对杨度的高论不以为然,他正色告:“此何时,此何事,项城(袁世凯别号袁项城)又何人,而可如是其轻且易耶?”梁启超洞烛袁世凯之奸谋野心,劝杨度勿上贼船,但杨度已经迷途难返。

1915年2月,袁世凯的长公子袁克定以杨度为媒介,在私宅宴请梁启超。酒酣耳热之际,杨度试探梁启超:“假设共和为君主立宪,不知道外间会怎么说?”他讲这话,目的是要套取口风。梁启超当然听得出弦外之音,就佯装酒醉,用“只问政体不问国体”一语搪塞过去。嗣后,梁启超隐身避祸,找了个借口匆匆离京,以躲避袁世凯和杨度的继续纠缠。在天津,梁启超发表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,抨击君主立宪制,为民主共和制辩护,公开与杨度唱反调,与袁世凯划清界限。据张一麟《袁幕杂谈》所记,“杨度往津,劝任公毁其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一文,任公不允,斥之甚厉,(杨度)面赤而退”。两位好友从此站在互相敌对的立场上。梁启超秉承古人风义,写信给杨度,道是:“我二人政见虽歧,私交如故。今后各行其是,不敢以私废公,亦不必以公害私。”然而两人已被卷入政治漩涡深处,公与私又如何能够撇个泾渭分明?越是声称不结交,就越是接近于绝交。



时务学堂故址。

3. 梁启超与皮锡瑞

皮锡瑞是晚清湘籍经学家,字鹿门,自署书室为“师伏堂”,人称“师伏先生”,他著述宏富,享誉学界。戊戌年(1898)五月初,他致书黄遵宪,盛赞“康、梁奇士,谭君伟人”,谭君指谭嗣同,可见他与维新党人气义相契。

皮锡瑞比梁启超大二十岁,他读过《时务报》,很喜欢该报主笔梁启超的文章,称赞其中一篇畅谈洋务的文章是“探源之论”。《四库提要》轻视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,皮锡瑞阅读原书后,认为顾炎武所言实为“对症下药”,其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:“梁卓如诸人议论,亦多推本是书,未可非也。”这表明他赞同梁启超的认知。

丁酉年(1897)十月下旬,梁启超乘船抵达长沙,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设宴为梁启超洗尘。在十月廿八的日记中,皮锡瑞记下了他对梁启超的第一印象:“梁貌不甚扬,亦不善谈,已到馆,初六上学。”以仪表论,梁启超确实不算美男子,谈吐也并不出众,但他的笔下功夫堪堪万人敌。同席的还有江南机器局总办蒋德钧和时务学堂总提调熊希龄,皮锡瑞称“蒋、熊皆开化党,所言皆变法事”,他对这类话题并无抵触情绪。

十一月初四,皮锡瑞与几位友人游览岳麓山,游毕过江,“饮至二鼓,谈时事甚畅”。席间,皮锡瑞问梁启超为何湖广总督张之洞不信康有为的素王改制说,梁启超的回答是“学派不合,且似

恐犯时忌”,这就说明张之洞还摸不准慈禧太后的想法,担心自己过早认同维新派会招惹嫌疑。此后多次晚宴,皮、梁均同席。

十一月廿九,梁启超赠送其新著《读春秋界说》给皮锡瑞,后者推服有加,自叹不如,“梁氏文笔甚畅,使予为之,不能如此透彻,才力之相去远矣”,他受到启发,欲发挥未尽之意,再作《春秋义说》,以求互相发明。十二月初一,皮锡瑞到时就学堂听梁启超讲《孟子》,头一次见识新教法,不禁赞叹道:“予谓后世有取士(法)、无教士法,如此方是教!”

在时务学堂,皮锡瑞看过梁启超批阅的文卷,感觉他的改笔“仍重文法”,对其得意门生黄遵宪、蔡良寅(即蔡锷)留下的印象是“皆幼而才,长于议论”。

戊戌年(1898)正月三十,梁启超患疟疾,皮锡瑞去探病,见到梁启超牵头联名,敦促各总督巡抚出奏,旨请禁革妇女裹足,皮锡瑞认为“此举若行,功德无量矣”。这年二月中旬,梁启超离湘往沪,后来又去了北京,他在时务学堂讲学,为期仅三个月。戊戌变法失败后,梁启超行踪飘忽,两人断了联系。后来,梁启超著《清代学术概论》(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),称赞皮锡瑞的《尚书大传疏证》“更补其阙失而续有发明”“其疏释专采西汉今文经说,家法谨严”。



1922年,梁启超访时务学堂旧址,寻得其26年前讲学处,书“时务学堂故址”。

4. 梁启超与蔡锷

蔡锷是梁启超最得意的弟子。梁启超到时就学堂讲学伊始,学生蔡良寅(即蔡锷)就引起了他的注意,这位少年相貌英秀,不仅听课认真,而且长于议论,文章写得很好。

1899年,梁启超从日本写信相招,蔡锷得到唐才常的资助,东渡扶桑,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习语言。翌年,他回国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活动,于起义失败后重返日本,决意入军校学习军事。1901年,蔡锷请梁启超写介绍信给成城学校校长,梁启超对于爱徒立志学好陆军科目心存疑虑,他说:“你是文弱书生,似乎很难担当军事重任。”蔡锷回答道:“只须先生为我想方设法,能够学陆军,将来不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军人,不算先生的门徒!”爱徒有这么高的心气,老师当然设法成全他。蔡锷说话算数,做事认真,入校后他刻苦自励,果然成为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的顶尖高材生,毕业时,与步兵科蒋百里、炮兵科张孝准一道荣获“中国三杰”的美誉。

1915年8月24日,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的第二天,蔡锷从北京搭晚车去天津探望师友,与梁启超、汤觉顿等人交换对时局的观感,他的情绪相当愤怒,对大家说:“眼看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,上劝进表,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,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?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,但没有凭藉,或者地位不宜,也难发声。我们明知力量有限,未必抗得过他,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,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。”好一个“为四万万人争人格”,这远比“为四万万人争权利”之类来得更为痛切。

政治斗争终须讲究策略,梁启超与爱徒蔡锷合计,决定两人分头行事,一个退至暗处,另一个进到明处。退至暗处的将来要用枪,以推翻袁氏政权为大任,“志存颠覆,则迹求隐晦,平日谨言词,慎交游,常恐以意外之疏忽而招来本事之损害”,必须潜心默运,不露声色,孤注不轻于一掷,目标不预先暴露;进到明处的现在就得用笔,以揭破袁氏假面为急务,则不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。袁世凯汲汲于称帝,筹安会的宣言已释放出明确的信号,梁启超觉得在这节骨眼上,他不能不发表针锋相对的文字,于是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见报,对帝制派施以迎头痛击。蔡锷在北京,天天与袁党周旋,梁老师的雄文一石激起千层浪,蔡弟子不可能不公开表态,他说:“我们先生是书呆子,不识时务。”袁党诸公当即抓住这个话柄,责成他去规劝梁启超收敛笔锋。他又说:“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?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,何必管他呢?”蔡锷的这些话带有权术作用,倘若不如此这般,其真实意图势必掩藏不住,正义事业就会遭遇极大的困难。

1915年1月底,蔡锷乔装出京,赴天津就医,秘密会晤梁启超,师徒二人分析了日趋悲观的时局,认为护国一役已经无法避免。梁启超与蔡锷郑约定:“成功呢,什么地位都不要,回头做我们的学问;失败呢,就死,无论如何不跑租界,不跑外国。”胜不谋权,败不惜命,这样的政治品格颇具极端性,虽非旷古未闻,却也是稀世罕见的!蔡锷与梁启超匆匆告别,变名易姓,从天津赴长崎,从长崎转香港,再经海路往越南过境,潜入广西,由广西至云南,在昆明与滇军旧部会合。护国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,洪宪王朝土崩瓦解。可痛惜的是,蔡锷因患喉癌病逝于日本。

梁启超撰《护国之役回顾谈》,结尾处笔触饱含深情:“蔡公死了吗?蔡公不死,不死的蔡公啊!请你把你的精神化作千千万亿化身,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。”最得意的弟子英年早逝,国家仍深陷于混乱的泥潭中,梁启超的锥心伤感早已广为人知。

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)